



培文书系

社会科学译丛

社会学家何为？

[美] 马蒂厄·德福勒姆 (Mathieu Deflem) 编 张倩 刘阳 译



Sociologists in a Global Age

Biographical Perspectives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FOR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Ruut Veenhoven

Professor of social conditions for human happiness

Published in Mathieu Deflem (Ed). Sociologists in a global Age: Biographical Perspectives, chapter 11, pp. 175-186, Ashgate 2007 ISBN 978-0-7546-7307-7 www.ashgate.com

Translation in Chinese published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2010
ISBN 978-7-301-16288-0 pp. 168-181

第 10 章

为了更好的生活质量

鲁特·费恩霍芬 (Ruut Veenhoven)



1942年我在荷兰出生，那时正值二战期间，我的国家被德国占领。我对于那场战争的记忆不多，但我确实还留有些许印象。孩提时我在我家附近被轰炸过的房屋废墟中玩耍，我在一个从前的犹太教堂里上主日学校，那个教堂的成员都被毒气毒死了。我生活的那个城市曾经是德国人大西洋战场的一部分，残余的防御工事像燃料仓和反坦克壕遍布这个地方。这些东西吸引着我，但我很难注意到这些东西背后的那些悲剧。我于安全的战后年代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我的父母都受过大学教育，父亲是位历史学家，母亲是位经济学家。父亲担任历史教师的工作，母亲在我小的时候是名家庭主妇，后来成为一名记者，我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大。

Correspondence: Prof. Dr. Ruut Veenhoven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P.O.B. 1738 3000 DR Rotterdam, Netherlands www2.eur.nl/fsw/research/veenhoven and North-West University in South Africa

成为一个学术人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成为一名学者。小时候我在校的成绩不好，所以几乎从未想过自己将来会从事学术事业。不过，在青少年期我已经很关注我将来的职业了。虽然在我脑海里没有什么明确的职业，但我觉得我有强烈的冲动想获得某种成就。这个动力部分是由对失败的恐惧激发而来。阶级意识在20世纪50年代仍然很强，而且我不想总待在父母身后。另外一个动力是我成长环境中的新教伦理，我觉得不得不通过某些途径来改进这个世界。我父母都参与了社会行动，我父亲参与了右翼政治，我母亲参加了消费者运动。我喜欢听他们谈论运动的进展如何，而且我自己也对那个时期更广泛的政治问题感兴趣，比如欧洲统一和去殖民化。在60年代，作为充斥在那个时代对社会改革需要的反应，我的政治兴趣加强了。因此在完成中学学习和义务兵役后，我想要为政策制定这样一个事业做准备。

为什么是社会学？

我最初的计划是学习法律并专攻公共管理。之后我听说在社会学中可以专修政策制定，因此我找了所有我能找到的有关这个新学科的东西。结果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社会学看起来比法律要更有趣也更有用，因为它直接针对社会问题。社会学同样也帮助我懂得了那个和我在军队中所接触的不一样的世界。我一开始阅读的社会学著作确实阐释了这些经历。

我决定学习社会学并入读鹿特丹的荷兰经济学院，它刚刚建立了一个政治导向的社会学系。我在1964年开始学习，那是那个系成立的第二年，教授很少而且缺乏经验，但是专业领域符合我的期待。我很用功地学习并且表现良好。

学术工作

在我还是一名学生时，我写的论文就有两篇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第一篇是对有关家庭特征和孩子教育的研究的述评，这是我大三时的一份作业。这项研究让我明白，我生长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母亲受过大学教育，这些对我个人的生涯来说都是一个良好开端。第二篇在大四时发表，在那篇文章里，我综

述了那时还很少的关于幸福的研究文献。在这两个例子中，我的教授们都建议我发表我的作品。

另外一件把我推上学者道路的事情是那时缺少师资。尽管有很多学生入学就读，但是毕业生仍然很少。因此，成绩优异的学生就被临时任用为教师，我就是其中之一。从大三开始我就协助经验社会学课程甚至还负责一些其他课程。我仍然记得我的第一堂课。那时当一个教授走进教室学生要起立仍是一个惯例。我教书的那个教室是木制剧场座位，站起来后座位会折叠起来，因此我的进入伴随着一片椅子折叠的咔哒声。我听到自己说“请坐”。

缺少教员也意味着系里会提供正式工作职位给一些毕业生，我又是其中一员，但由于我是第二届学生，社会学助教的职位已被占完。不过一位新任命的社会心理学教授的助理职位尚缺，他让我担任这个工作，我接受了。

那时候我仍然没有以学术生涯作为我的目标，我之所以接受这一助理职位，只不过是因为这个职位可以让我写博士论文，而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就可以去人力市场找工作。但是，形势比人强，博士论文比预想的花了更长一段时间，并且它让我变得对心理学十分精通。同时我发现我在大学里的带薪工作与自愿的社会行动结合得很好，而且学术工作带来的收入比我期待的也要多。所以最后我决定接受我是一个学者这个事实，而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学者了。

社会行动

从早年开始，我就一直参加俱乐部和委员会。我喜欢博弈，有时我还会发现自己在寻找个中原因。

学生激进分子

当我还是大学生时，我做过很多板报，并是地方学生杂志的编辑。我从我母亲对消费者联盟的研究中得到启发，参与了学生利益代表活动。在60年代许多大学都是人满为患，教学经常很差劲。我参加了学生会，并组织了一项关于课程质量的全校学生调查。这使我差点丢掉学生助理的工作。

虽然我在学生利益代表方面很激进，但在更宽泛的政治中却是一个温和派，

60年代后期我的很多同学变得非常激进，而且新确立的利益表达结构成为革命煽动的平台。在我担任助教的第一年里发生了一场学生造反运动，这场运动不仅占领校舍，还搞了一次混乱的群众投票大会。所争执的问题，一个是学生权力（一人一票），另一个是包括废除考试和课程在内的教育改革。我发现自己夹在保守的教授和无政府主义的学生中间，同时被这两大阵营轻视。看着这场运动难以控制地发生是吸引人的，但却很难理解这一现象。我的社会学知识在这个时候变得十分匮乏，但我却在我开始教的社会心理学中发现了很多线索。

性改革

我对性改革运动更为投入，这场改革同样始于60年代。尽管我自己的性发育很晚，但我早早地就加入了性改革协会。我通过有关学生事务的活动参与其中，比如校园大楼里避孕套的出售，以及在学生寝室过夜等。这把我带进了更广阔的问题中，比如禁止婚前性行为、限制色情文学、歧视同性恋。所有这些在我的国家变化得很快，回顾过去，可以说我见证了“性革命”。

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对性的压制造成了很多问题，但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多地限制这种自然的驱使。禁忌有什么用呢？谁从中受益了？我在当时的社会学中又没有找到好的答案，但是最近对宏观社会学的阅读让我看到了性禁忌在农业社会的逻辑。由此我认识到，当时我是在与一种“文化堕距”（culture lag）^[1]进行斗争，也因此明白了我们的斗争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就取得了胜利。

堕胎

性改革运动的目标之一是撤销谴责堕胎的法律。当时堕胎有很大需求，意外怀孕由于对性的无知和缺少好的避孕方法（得不到避孕药）而变得很猖獗。我的很多同学都不得不过早结婚，我自己也险些这样。我的女朋友怀孕了，但是我们通过非法堕胎逃过了强制结婚。找到一个医生很不容易，花了我们很多钱而且风险很大，但是堕胎让我们可以自己选择一个时间建立家庭，那是在五

[1] “文化堕距”是美国早期社会学家提出的一个概念，大意是指文化要素在传播过程中，快慢速度不同，技术文化的传播速度快于观念文化的传播，造成文化接受国技术文化与观念文化要素之间的错位。本文当是化用这一概念，意指我们的技术和生活方式早已进入成熟工业社会，但性道德还停留在农业社会。——译者注

年之后。

这一个人经历给了我一个我正在寻找的个案，我投身堕胎法律改革中，当时认为这可能是一个终身任务。我一头扎进相关文献，了解到其他国家的游说组织，比如英国堕胎法律改革协会。在学过社会学的背景下，我在荷兰人中做了一个政府机关和政治团体关于堕胎立场的分析。我吃惊地发现，大多数是无知、犹豫，最终我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这个问题破坏了那么多公民的个人生活却还没有提上政治议程。

几个月后，我听说有人计划在鹿特丹开一个堕胎诊所，这是一群主张计划生育的医生的动议，医生们希望，通过公开宣告这一意图，就能给地方医院施加压力，让它们充分利用法律提供的可能性。我参加了这个团体，并负责动员政治上的支持。我运用了在社会学里所学到的关于游说和压力集团的知识。我们要求上百个组织公开支持我们：专业协会，教堂，政治团体和女性团体。我们也开始集资并要求报纸和杂志免费为我们刊登广告。这带来了山崩海啸般的公众注意和讨论，并最终导致鹿特丹市政委员会决定在财政上支持堕胎诊所。不过堕胎仍是非法的，而且只能合法化为一个医疗决策，这跟必须截掉一条被感染的腿来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比起来差不多。这个法律基础无论怎么薄弱，它还是足以建立一个“容许”政策，一种在荷兰政治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冲突解决方式。我们在1971年开了堕胎诊所，之后不久另外六家诊所也在荷兰建立。

让堕胎法适应这个新的事实花费了很长时间。堕胎已经成为一个象征性问题，因此很难就此达成一个政治妥协。这种政治上的僵持状态给我们留下了发展空间，创立了一个可以在西欧其他一些国家提供服务的堕胎诊所网络的空间。诊所被组织成一个协会，这个协会的其中一个任务就是保证治疗质量，另一个任务则是为更好的堕胎法游说。我担任了12年协会主席，在主席的位子上，我从一个社会学家的训练中受益良多。我学到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信息在实际政策制定中很重要，因此我们在调查上做了很多投资。我们做了很多关于客户特性以及他们在手术后如何行为的定量研究，我们也做了很多关于避孕失败和懊悔的定量研究。基于这一根据我们揭穿迷思并主导讨论，该法律在1984年被最后修订并使堕胎的地位得到合法化，尽管13年前就需要这种合法化。荷兰的例子促进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堕胎法改革，在那些国家，意外怀孕和非法堕胎的社会问题已经不复存在。

自愿无儿女

通过介入堕胎和避孕问题，我意识到人们可能会想要建立一个不要小孩的家庭。放弃父母职责在60年代末进口口服避孕药后在技术上变得可行，但在70年代中期还不被社会接受。这可以看做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我担心人口过剩，关心意外怀孕生下的儿童的福祉。我估计一个态度运动 (attitude campaign) 可能会有帮助，我还曾见过这方面的好例子，即美国的一个无父母组织 (organization of non-parents)。我成立了一个关于自愿不要孩子的信息中心，在十年时间里，信息中心一直提供关于赞成或反对不要孩子的信息。我们制作书、录像纪录片、信息传单，以及给教育者的建议。这些信息被媒体、特别是妇女期刊贪婪地采用。自愿无子女如今已被广泛接受，但是仍然不被看做是什么值得赞许的事情。

研究

我喜欢做调查研究并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在1970年代，我的研究与我的社会行动并行，并且大多是关于堕胎、无孩及家庭问题。自那以后，我专注于进行关于幸福的研究。

堕胎

我的第一个经验调查是一个医生调查。那项研究是用来估计在荷兰的意外怀孕数目和评估医疗职业界对法律改革的支持度。这项研究是把堕胎提上政治议程的一个更广泛尝试的一部分。项目开始后，我受委任去执行一个关于自由堕胎可能产生的后果的文献研究。这一研究涉及堕胎的医学风险，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人口统计学上的后果和社会后果。其中一个问题是堕胎法的撤销是否会导致道德败坏。后来我也指导过很多研究，这些研究都是关于堕胎诊所组织，此外还有堕胎的趋势和避孕法以及预防意外怀孕的策略。研究的很大一部分都可用作抨击关于堕胎的那些错误信息及在实际的政策讨论中占得上风。

有孩子

那些考虑不要孩子的夫妻经常会面对这样的想法：这亵渎了天赋的对子孙

后代的需求，特别是女性的“母性本能”。如果无子女违反了真正的需要，那么这必须显示在无儿女的夫妻生活得不是很好这上面。我在对一个健康调查的二手分析 (secondary analysis)^[2] 中检验了这个假设，结果是，在没有子女和有子女的夫妇之间，在自我报告的健康、身心抱怨、对生活意义的认知或幸福上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同。事实上，无子女的夫妻甚至表现得要更好 (Veenhoven, 1975)。在之后的研究中，我发现孩子的出生使幸福降低了一些，主要是因为孩子出生对婚姻的影响 (Veenhoven, 1984a)。我也考虑过独生子女的命运。他们是否像不满的知识分子 (unhappy eggheads) 一样长大？数据显示并不是这样 (Veenhoven, 1989)。作为我咨询活动的一部分，我也会就更广泛的问题发表意见，包括养孩子的成本、养孩子的时间安排及领养问题。所有这些意味着纠正消极的刻板印象，让人们能作出知情的决定。

幸福

我选择社会学的原因之一是，期望社会学研究可以教我怎样去改进社会。因此我企盼着学习一个好的社会是怎样的。但让我失望的是，我的教授们并不能为我提供一个对于这个问题的明确答案。我被告知，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且主观评价是不科学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同学则告诉我另外一个故事，并坚持认为一个好的社会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即使社会成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发现了一个观点，即最好的社会是创造“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社会，更有趣的是，这是我在一堂社会哲学课上听到的。对我来说，这种后果伦理 (consequential ethics)^[3] 比当时的意识形态狂热更有吸引力，而且我觉得在经验上评估幸福结果也是可能的。

当时，我刚刚学会将“权力”和“声望”等概念进行测量，并且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测量幸福。发现叫做幸福的这东西实际上是不可测量的要花很多时间，但是作为对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幸福，却是现存于我们的头脑中的，因此

[2] 这是社会学经验研究方法中的一种，即使用别的研究者为了特定目的而进行的研究中所包含的资料，用于自己的研究目的的分析。——译者注

[3] 即不是从行为的动机、而是从行为的后果进行道德评判的伦理学观点。作者这里化用的是英国思想家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是边沁对“功利”所下的界定。——译者注

也就可以用问卷进行评估。以这一洞见为基础，我写了一篇论文，清理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已有文献，这些研究在1968年还不是很多；而且能得到的数据只比较了社会内部的差异，而我的主要兴趣是社会之间的比较。但是单是我提出的方法，就足以让这篇论文在荷兰社会学期刊上发表。

在我毕业后的几年里，我在很多讨论中都用到“幸福”这一概念，但我并没有真正专注到这上面。在关于堕胎的讨论中，我主张限制法令的撤销可以预防非自愿的父母和不想要的孩子的很多不幸福，虽然我无法证明这一点。在关于自愿无子女的讨论中，我主张放弃孩子并不会让生活变得不满意，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我能从经验上证实这一点（Veenhoven, 1975）。我在婚姻未来的讨论中也用过有关幸福的数据。作为对在现代社会中婚姻正在回归这一主张的响应，我用研究表明，一般而言，那些已婚的人比未婚的更幸福，而且婚姻的这一积极影响会随时间推移逐步增强（Veenhoven, 1983）。

生活目标和幸福

我的社会心理学教学工作使我对个人的幸福差异，以及通过培训和建议增加个人幸福的可能性产生了兴趣。我的老板兼博士导师是一个心理学家，这也是我转变关注点的另一个原因。我决定在生活目标和幸福之间的关系这个方向上做我的博士研究。我想证明，进行生活计划是大有回报的。对于这个假设，我有知识上的论证，但实际上的主要原因是我自己就对生活进行计划，我猜想如果人们像我那样做的话他们会更幸福。我的一个具体假设是，头脑里有明确目标的人们，其潜能会发挥得更全面和有效，因此他们也就会更快乐。另外一个假设是，有些目标会比另外一些目标更有助于幸福，尤其是那些企图在零和博弈（zero sum games）中胜出的人，一般说来都不大快乐。

我通过一个费劲的调查来验证这些假设，在这项调查里，生活目标是用一个自我设计的语句完成测试来评估的，幸福是用心情的日常记录来评估的，我确实发现了生活目标本身的差异，但却没有发现有明确目标的人们比别人更幸福。在经过三年研究之后，我意识到我的调查的典型选择（cross-sectional）不是很合适，而且生活目标对幸福的影响只能通过追踪研究找到。总之，这项研究总体来说不能作为一篇博士论文。我把原稿扔进抽屉里，并转向我早期对幸福研究文献的清理工作。

幸福的条件

与此同时，对幸福的文献研究则得到扩展。我发现，1968年只有约20个经验研究，1980年则有近500个这样的研究。我抱着为大多数人的更大幸福的政策干预创造一个证据基础，而着手系统地描述这些研究结果。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把“幸福”定义得更加清晰，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选定合意的幸福指标。随后我发现，许多以评估幸福和生活满意度为目标的研究，事实上测量了别的东西，大部分是心理健康和满意度的结合。我搜集的经验研究中只有一半（245）符合我的概念。

从这些研究报告中，我提取了所有分散的和相关的调查结果。我用一个标准术语一个一个描述这些调查结果，然后按国家和主题把它们进行分类。这样我就把这些调查结果从研究报告中分离出来。所有的调查结果都收入卷数众多的幸福数据手册中（Veenhoven, 1984a），这个数据手册后来成为一本题为《幸福的条件》的书的基础（Veenhoven, 1984b）。这些研究成果一起成为我的博士论文。

《幸福的条件》给到80年代早期的幸福研究做了一个综合。书中有很多观察事实。和大多数文献回顾不同，这本书没有包含原调查者对调查结果的解释，这更多的是一个数据分析而不是研究综述。

两种幸福的条件要辨别清楚：外界环境条件和内部心理条件。被讨论的环境决定因素是人所生活的社会及其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特性。内部心理决定因素是健康、个人生活方式、激情和信念。当时这些结果并没有考虑到幸福的环境决定因素和内部决定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世界幸福数据库

我继续自己关于幸福的研究数据，并在1990年代早期出版了一个升级版——包括一个参考书目（Veenhoven, 1993a），一本关于各国幸福的书（Veenhoven, 1993b），以及三卷对相关关系的分析发现（Veenhoven, 1994b）。1990年代末期，这一系列书进入了一个叫作“世界幸福数据库”（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的电子数据库，并且在网上也可以看到（<http://worlddatabaseofhappiness.eur.nl>）。数据库包括以下目录：

- 参考书目：囊括对生活进行主观评价的出版物，即使这个议题在该研究中只是附带性的。它包括一个科目分类，现有 5000 个条目。
- 指标库：包括所有被使用过的对幸福的测量方式，并链接到用这些测量方式得到的结果。目前的目录：600 种测量方法，其中主要是单问题。
- 抽样的调查结果：1946—2005 年 122 个国家关于幸福的全国调查结果，约 3000 个。
- 对相关关系的分析发现：用标准的摘要方式来描述，并以主题和方法排序。

维护这个数据库需要大量的工作，但经费很紧张。部分工作由志愿者来做，一开始主要是学生和待业的社会学家，最近主要是从不同背景中退休的人。他们中的一员是汉克·迪希尔 (Henk DeHeer)，一个电脑技术专家，也是参与创建这个数据系统的老朋友。我的大学为志愿者们提供办公室和设备上的帮助。

好社会

所有这些告诉了我们哪些关于好社会的知识呢？首先，人们在现代个体化社会中兴旺繁盛 (Veenhoven, 2005c)，而且比在传统集体主义社会中要更有活力 (Veenhoven, 1999)。其次，我了解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这样的国家可以实现：这些国家给他们的公民最大限度的自由，治理良好，并且有一个民主制度 (Veenhoven, 2000a, 2004, 2005a)。使我感到惊讶的是，由国家提供的福利多少并不影响幸福感 (Veenhoven, 2000b)，同样，国内收入不均程度也对幸福感没有影响。这些发现更多与自由主义政治议程相吻合，而与社会民主主义相反。

这样一来也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不是每个人都同等幸福呢？社会学理论会认为是社会地位造成这方面的差异，但这最多只能解释现代国家中约 10% 的幸福感差异。还有 40% 的差异是由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造成的；在这方面，自由社会里那些有良好心理准备的人要更有优势 (Veenhoven, 2001a)。心理方面的因素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并不意味着生活条件与幸福无关，而仅仅表明拥有这样心理条件的人所处的社会条件相当不错。这同样反映在纯粹运气的有限作用中。不为人所控制的生活事件只解释了幸福中 15% 的差异^[4]。

[4] B. Headey and A. Wearing. 1992, *Understanding Happiness: A Theory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Melbourne: Longman Cheshire.

社会不平等

与此同时我也了解到，社会不平等在现代社会中并没有像大多数社会学家想的那样成为一个问题。就像上面提到的那样，跨国比较显示，收入不均程度低的国家的人并没有比收入不均程度高的国家的人更幸福，国内的比较也没有显示出穷人和富人的幸福感有明显差异。性别差异显示出有更大的关系，在妇女地位更平等的国家里平均幸福感要更高。

另外一个意料之外的发现是，幸福的不平等在现代社会里一直在减少。当我把幸福标准差用作指标 (Kalmijn & Veenhoven, 2005a) 并考察时间中的趋势时，我发现了这一点。过去 30 年来幸福水平的分化，似乎在现代国家中越来越少 (Veenhoven, 2005a)，这一降低独立于幸福平均水平的温和增长。

对我工作的接受情况

我在堕胎和无子女上的研究工作赢得了媒体的很大关注，尽管研究丝毫不是因为这个目的而开展的。我在幸福上的研究成果也被新闻界很好地报道了。就堕胎来说，我很肯定它影响了政策决策，但是关于幸福，我还不能这么肯定地说。

我的工作在社会学家同事中得到的更多的是保留，尤其是在那些能决定我是否申请到研究基金的社会学家中间。目前我遭到了两家社会学期刊的冷淡对待^[5]，它们拒绝刊发我的论文，这篇论文是关于现代社会中幸福感不平等程度的降低的 (Veenhoven, 2005a)。我认为这篇论文的研究成果是一个重大发现，但是评审专家则把它看做一个异端，并提出了所有关于幸福的误解来质疑我，其实这些误解全被最近的研究反驳了。真正的问题出在理论上：社会学家倾向于从社会建构和相对剥夺来看待幸福，因此认为我的观点是异想天开并具有文化相对性 (Veenhoven, 2006b)。这种理论信念使他们对证据视而不见，其实幸福是人类活力的一种表现，在这方面它与身体健康非常相似，因此它是社会制度宜居性 (livability) 的一个好指标 (Veenhoven, 1996, 2000c)。

[5] *Netherlands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我把这看做一个很快就会过去的问题，而且我相信幸福这一主题会在主流社会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困扰我更多的是对幸福研究的制度性支持很少；对幸福的好奇心是有的，但是愿意为此类研究买单的组织却并不多，因此幸福研究更多的是依靠很少的学术经费。

国际合作

我早前在堕胎和家庭问题上的研究主要针对国内市场，因此很少触及和其他国家同事的交流。但是我的幸福研究确实包含了许多国际合作：不仅大多数数据来自其他国家，而且用户也分布在世界各地。

我通往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敲门砖是《幸福的条件》一书。我把这本书交给了雷德 (Reidel) 出版社 (现在的斯普林格 [Springer] 出版社)，这是一个大量出版学术期刊的公司，这些期刊中包括《社会指标研究》(*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手稿最初交到哲学编辑的桌子上时被拒绝了，但最终在《社会指标研究》的编辑阿历克斯·密查洛斯 (Alex Michalos) 那里则被接受了。他在帮助我的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学组织的社会指标研究工作团队介绍了我。这里有一群很好的人，这里也是一个众多交流碰头的好地方。如今这个工作团队与生活质量管理研究国际组织紧密连接在一起，后者不仅有社会学家，还有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参加。

起初，《社会指标研究》是关于幸福的论文的主要出路，当这个主题发表的文章日益增多时，我提议出版商应该开办一个幸福方面的单独期刊，就叫做《幸福研究杂志》^[6]，我和阿历克斯·密查洛斯^[7]、埃德·迪纳 (Ed Diener)^[8]、鲍勃·卡明斯 (Bob Cummins)^[9] 一起成为这个期刊的编辑。期刊创立于 2000 年并且运转良好。当前，好几本关于生活质量的新学术期刊正在酝酿当中。

我的幸福世界数据库是一个幸福信息的国际票据交易所。我和很多数据递

[6]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可下载自 [Http://springerlink.com](http://springerlink.com)

[7] 来自加拿大 University of Northern British Columbia。

[8] 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9] 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的 Deakin University。

交者联系, 这些研究者同行告知他们的研究, 并检查我是否把他们的调查结果准确地输入了数据库。我并不认识所有用户, 但我知道我的数据库用户有很多, 而且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学者。对我们所有人来说, 幸福研究者指南^[10]是我们相互保持联系的方法。

参考文献

- Kalmijn, Wim and Ruut Veenhoven. 2005a. "Measuring Inequality of Happiness in Nations: In Search For Proper Statistic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6: 357-396.
- Veenhoven, Ruut. 1975. "Is There an Innate Need For Childre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 495-501.
- . 1983. "The Growing Impact of Marriag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2: 49-63.
- . 1984a. *Conditions of Happiness*. Kluwer Academic, Dordrecht/Boston.
- . 1984b. *Databook of Happiness*. Complementary reference work to *Conditions of Happiness*. Kluwer Academic, Dordrecht/Boston.
- . 1993a. *Bibliography Of Happiness: 2473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Subjective Appreciation of Life*. RISBO, Studies in Sociale en Culturele Verandering, nr. 1,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 . 1993b. *Happiness In Nations: Subjective Appreciation of Life in 56 Nations 1946-1992*. RISBO, Studies in Sociale en Culturele Verandering, nr. 2,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 . 1994a. "Is Happiness A Trait? Tests of the Theory That a Better Society Does Not Make People Any Happier."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2: 101-160.
- . 1994b. *Correlates of Happiness*. RISBO, Series Studie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3 vols).
- . 1996. "Happy Life Expectancy. A Comprehensive Measure of Quality-of-Life in Nation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9: 1-58.
- . 1999. "Quality-of-Life in Individualistic Society: A Comparison in 43 Nations in the Early 1990'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48: 157-186.
- . 2000a. "Freedom and Happiness: A Comparative Study in 44 Nations in the Early 1990's." Pp. 257-288 in Diener, E. and E.M. Suh (eds) *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 2000b. "Well-Being in the Welfare State: Level Not Higher, Distribution not More Equitabl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2: 91-125.
- . 2000c. "The Four Qualities of Life. Ordering Concepts and Measures of the Good Lif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 1-39.
- . 2001a. "Happiness in Society." Pp. 1265-1314 in Jrtta Allmendinger (ed.), *Gute Gesellschaft? Verhandlungen des 30 Kongresses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Soziologie* Opladen, Germany: Leske & Budrich.
- . 2001b. "Are the Russians as Unhappy as They Say They Are? Comparability Of Self-Reports Across Nation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 111-136.
- . 2002. "Why Social Policy Needs Subjective Indicator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58: 33-45.

[10] 这个指南是世界幸福数据库的一部分, 提供研究者的地址信息, 及其在幸福书目中发表的研究成果。

- . 2004. "The Greatest Happiness Principle. Happiness as a Public Policy Aim." Pp. 658-678 in Linley, P.A. and S. Joseph (eds) *Positive Psychology in Practice*. Hoboken, NJ: John Wiley.
 - . 2005a. "Return of Inequality in Modern Society? Test By Trend in Dispersion of Life-Satisfaction Across Time and Nation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6: 457-487.
 - . 2005b. "Apparent Quality of Life: How Long and Happy People Liv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1: 61-86.
 - . 2005c. "Is Life Getting Better? How Long and Happy Do People Live in Modern Society." *European Psychologist* 10: 330-343.
 - . 2006a. "Rising Happiness in Nations 1946-2005: A Reply to Easterli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forthcoming.
 - . 2006b.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Eid, M. and R. Larsen (eds), *The Scienc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 Tribute to Ed Diener*. Guilford Press, forthcoming.
 - . *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 Continuous Register of Research on Subjective Appreciation of Life*. Website: <http://worlddatabaseofhappiness.eur.nl> (since 1984 in book form; since 1994 in initial website form [ftp]; and since 1998 in its current website form).
- Veenhoven, Ruut and Maykel Verkuyten. 1989. "The Well-Being of Only Children." *Adolescence* 24: 155-165.
- Veenhoven, Ruut and Joop Ehrhardt. 1995. "The Cross-Cultural Pattern of Happiness. Test of Predictions Implied in Three Theories of Happines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4: 33-68.
- Veenhoven, Ruut and Wim Kalmijn. 2005. "Inequality-Adjusted Happiness in Nations. Egalitarianism and Utilitarianism Married Together in a New Index of Societal Performanc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6: 421-455.